

会馆史研究的新高度

——王日根《中国会馆史》述评

江 涛

1996年,王日根先生出版了《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一书。该书运用社会学方法,取向社会史的角度,把会馆置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大环境中,全面考察了会馆发展演进过程及其兴盛的背景,深入分析了会馆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进而全方位、多层次地阐述和论证了会馆的历史地位。该书出版后,《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史学集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台湾《东吴大学学报》等均刊登书评,给予了较高评价。此后,王日根先生继续耕耘于该领域,继续发表了系列论文,对会馆前史、会馆在近代以后的演变,会馆在社会变迁中的功能及其局限等作了进一步思考,并观照目前国内外的学术成果,近期,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中国会馆史》则将会馆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近年来会馆史研究呈现兴盛局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龚季良《同乡组织的研究》主要考察会馆的组织状态,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主要是把会馆作为移民的索引。50年代以后,会馆多被当作行会,成为讨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指标。

近期的会馆研究视野有了较大的扩充。例如,在目前兴盛的城市史研究中,有一些学者关注城市的空间结构,力图对城市的形成机制、城市的功能区划、城市的文化设施等展开讨论。如刘凤云《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对明清城市空间的分布与结构,包括城市的建筑组合进行了全面的探索,研究的内容涉及到会馆、园林、茶馆等。本书还选择剖析城市空间中的物质内容,即对建筑组合与分布状态中的人文因素与文化内涵进行研究。作者广辟资料来源,从浩瀚的笔记、方志、诗歌、小说中铢积寸累,提炼出有关城市空间的文化内容与思想。刘凤云认为:在商人追求“名高”、向往儒化的趋势下,在“士商异术而同志”的观念变迁的影响下,会馆中士商“混迹”的现象屡见不鲜。或是士商共同主持会馆事务,或是士商合为一体宴会游憩,节日期间会馆举行的团拜、演艺活动更是打破

了士庶的界限,浓烈的乡谊模糊了社会等级的界限,在一定意义上说,“会馆在非自觉之中在尝试着沟通士商之间的鸿沟,尽管在会馆中仍存在着官商之间的等级差别,但是在乡缘乡谊为前提的交流中,士贵商贱的传统观念已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有多篇文章讨论到会馆在城市中的位置、会馆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及会馆与书院、行会间的关系等问题。

有的从法制史的角度研究会馆问题。如台湾“中研院”的邱澎生在台湾出版的《法制史研究》第十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由公产到法人——清代苏州、上海商人团体的制度变迁》的论文。该文认为:18世纪至19世纪之间,苏州、上海两地商人捐建成立的会馆、公所,因为常将其专属建筑物向地方政府“立案”,而被当时司法体系逐渐认定为某种值得保护的“公产”,并演化出种种“公产立案”的法律执行惯例。至于20世纪初年成立的商会,则随着当时“地方自治”运动的展开,而被纳入清末政府借自近代西方法律“法人”观念的相关法令中,商会被赋予联结中国商人以对抗外国商业竞争的任务与权力。由公产“立案”到设置“法人”,不仅显示出清代商人社团在都市社会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加,更呈现出两种类型不同的制度变迁。整体而论,清代苏州、上海地区会馆、公所被地方政府纳为“立案公产”的制度变迁,可说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演化”。政府被动地保护商人产权,从而使商人团体的公产“立案”制度被更有效地纳入地方行政与司法体系之中。商会的“法人”地位则更像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改造”,这种制度百年前与会馆、公所的“由下而上的演化”是颇为不同的类型。

地域性的会馆研究著作纷纷出现,如王兴亚的《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开封市地方志编委会、开封市文物事业管理处合编的《山陕甘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近期,由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会馆文化丛书》(第一辑)分《走马飞舟除旗镇》、《黄河汴京徐府街》、《洛水廛河映王城》和《漕运重地周家口》4册,它们分别从会馆入手,在呈现明清商业文明繁盛的同时,梳理商业会馆成长发展的脉络,展现其文化内涵,勾勒贯通中原的商路,是了解中国古代商业会馆的通俗读本,也是研究会馆文化的珍贵文献。

许檀对河南会馆进行了系列深入的研究。如《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清代河南除旗镇的商业——基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明清时期河南商业城镇的个案考察》(《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等,对河南各商业城镇山陕商人的经营活动、会馆组建及其运作进行了翔实的分析和研究。

刘正刚的《广东会馆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堪称“地方性会馆研究的厚实之作”。作者用10年的心力,通过广搜文献、辅以田野考察,搜集了丰富的广

东会馆史料,对各地的广东会馆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排比,为广东会馆史的进一步深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蓝勇、任放、范金民分别对长江上、中、下游会馆的分布进行过分析,揭示了会馆作为商业发展的成就的标志意义。像刘芝凤的《发现明清古商城》是关于湘西洪江的揭示,周昭京的《潮州会馆史话》是关于潮州帮商人会馆的专题研究成果。还有韩顺发著《伏帝神工开封山陕甘会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社旗县文化局编著《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王支援主编的《潞泽会馆与洛阳民俗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胡春焕、白鹤群著《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汤锦程著《北京的会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黄浙苏、钱路、林士民编著的《伏安会馆》(中国文联出版社)等,像王云对聊城山陕会馆有专门的研究,李刚、宋伦也偏重研究山陕会馆。

近期,一些研究讨论到会馆与商会问题。如冯筱才的《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2004年版),陶水木的《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李坚的《上海的宁波人》等。

从资料上看,近期出版了若干资料集。如彭泽益主编的《中国行会史资料集》,王国平、唐力行主编的《苏州社会史碑刻资料集》等。

总体上看,近期会馆研究中,呈现出许多新的拓展。主要表现为:地域性会馆研究继续得到加强,会馆研究摆脱了传统的囿于行会史的做法,更多地关注到城市布局、社会功能及文化内涵等方面。这其中王日根的《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一书具有一定的带动作用。

二、王日根对会馆史的继续深化研究

王日根在对明清会馆研究的基础上,在《中国会馆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7月版)一书中,对如下三点进行了深入研究,拓宽了读者的视野,从而把会馆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会馆的前史与近代会馆史。

王日根认为:“明代以后出现的会馆与过去的郡邸、进奏院、朝集院并不具有源流关系。汉代的邸舍等为官设机构,而明以后的会馆则纯属私设,属民间结社。这也许与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中央集权比较直接,而后期中央集权日显间接化的趋势相吻合。前期的邸舍包含了后期的会馆的基本功能,但后期会馆则显得更加灵活,更有活力,更能适应形势的变迁,也更能广阔的空间发挥作用。”从商业上看,行是传统政府实施管理的基本机构,但到明代以后,行的运行却经常偏离正常的轨道,官牙和私牙时常构成对商业活动的威胁。“在牙行管理中出现的诸多弊端,常常是官府败坏的表现形式。”这在某种程度上迫使商人模仿官僚建立自己的会馆组织,从而保护自己的利益,壮大自己的商业事业。

会馆的同乡性是会馆得以建立的基本纽带。会馆兴盛时期主要从明初至民国

时期,其间尽管呈现出蜕化转型,乃至商会成立后会馆以团体会员形式加入商会,同乡纽带依然坚韧。在海外,会馆则一直兴盛至今,同乡性依然是一条基本纽带。这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团体意识的组织形态,其中有诸多积极的意义,也不乏若干消极的影响。一些会馆个案的剖析足以给我们明晰的认识。

会馆与科举制度、移民运动相联系,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会馆支持科举的功能消失了。有的会馆转化为政治活动场所,有些会馆成为乡邦在政治中心的联络点。政治中心的转移亦往往直接导致以支持科举或联系朝廷为主的会馆的衰落。总之,民国以后会馆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说已无可奈何地衰亡,而是呈现出多元性的发展趋向。

2.会馆的属性及其与政府的关系。

虽然会馆的类型复杂多样,但会馆的属性也大体一致,即均把“祭神、合乐、义举、公约”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乡土神是乡邦凝聚的精神纽带,同乡的联谊、相互济助是日常活动的基本内容,共同遵守“公约”是维持商业信誉、地域人声誉的重要保证。一般情况下,会馆追求对正统文化的皈依和遵从,在官府的印象中颇类似于慈善救济一类的组织,可以发挥赈济贫弱、规范流动同乡行为、减轻社会矛盾甚至扶助社会公益事业等功能。于是,会馆往往与政府有着较一致的文化追求,会馆本身多不表现为对传统文化道德的否定,而是体现出对传统优秀道德的维持和坚守。

正因为如此,会馆与政府间并不表现为矛盾与对抗,而是存在着相互补充、彼此互摄的关系。虽然在会馆建设的早期,会馆处于自发的状态,却发挥着敦厚官品、官僚们相互淬砺的功能。到了明末清初,会馆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避免地方恶霸势力对会馆的侵害,申请立案,亦往往得到政府的支持,且以碑铭的形式昭告世人,这更体现了二者利益的相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宜拘泥于西方官民二元对抗的思维定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民往往遵守着共同的价值理念,均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分别以不同的身份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尽着自己的努力。王日根认为:在明清社会管理中,官方和民间各有自己的“自域”范围,又有共同可以参与的“共域”范围。王日根试图摆脱对西方学者“二元对立”和“公共领域”等解释体系的简单套用,力求寻找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优良传统,这一努力体现了作者对学术本土化的追求。

3.会馆文化走向与中国社会走向的思考。

王日根认为:会馆有着积极的文化追求,其中既有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的互渗、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的交融,又体现出对文化的继承和文化的更新的兼顾,其积极追求进步的导向性是很明显的。这或许应成为中国社会走向的一种参考路径。

王日根认为:会馆文化往往通过会馆的神灵设置来体现。先是单一的乡土神设置,后来逐渐兼容全国通祀神及其他地区的神灵,呈现出多神的兼容,这些神灵虽脸谱各异,却均包含着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影从。

文化的发展进步必然包含文化的继承与文化的更新两个方面。“会馆的初建者

把对传统美德的继承放在首位,而会馆的后继者们亦多受熏染,且信之弥坚。“通过捐助“倡导一种向善好义的社会风气,可保持优秀文化品德的延续”。会馆文化的追求更新体现在对近代社会变迁的不断适应上。“由官绅管理、商人出资的经营体制本身即意味着对传统四民观的观念更新”、“义利相得”是会馆倡导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冲破了传统所谓“君子罕言利”的窠臼,这对经济发展和道德完善都颇有裨益。“会馆对政治事务的干预、对社会事务的承担都反映了其不断适应形势所进行的自我更新。”

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使王日根对会馆发展的全史有了一个总体性、全局性的把握。通过会馆这一最能反映明清社会变迁的社会管理组织,回答了中国社会管理模式、政治文化理念、文化的传承等重大理论问题,给读者以较广阔的运思空间。

三、继续开展会馆史研究的广阔空间

客观地说,王日根的会馆史研究仍主要偏重于对会馆理想性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了会馆的积极方面,就具体会馆所作的个案解剖仍很不足,会馆中所呈现出的富人俱乐部性质、会馆管理者对公共财产的侵蚀、一些会馆之演变为政治的对立面等方面问题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会馆自明代出现以后,历经时代变化,会馆本位的坚持、会馆功能的扩展,以及会馆管理方式的变化中内容丰富,也值得当更细致地解剖分析。

就会馆资料而言,目前许多地方修复了经风霜剥蚀的会馆建筑,一些会馆的碑刻也重见天日,会馆征信录、账簿、会馆的纪念刊纷纷被挖掘出来,海外会馆更是散布于世界各地,各自的活动记录多有保留。因此,我们期望着王日根能坚守这一领域,做更多的资料搜集和汇编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会馆史的研究。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刘 强】

